

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研究丛书

From Edge to Core:

the Research on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 Region's
Opening Econom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FTA

从边缘走向前沿： CAFTA背景下西南边疆地区 开放型经济研究

◎胡超 著

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研究丛书

**从边缘走向前沿：CAFTA 背景下
西南边疆地区开放型经济研究**
**From Edge to Core: the Research on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 Region's Opening
Econom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FTA**

胡 超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内 容 简 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框架下,西南边疆地区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显著优势,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是西南边疆地区从边缘走向前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难得机遇。首先,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框架的建立有助于打破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内卷式”发展的怪圈,有助于扩大贸易规模,进而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牢牢把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带来的贸易、投资等市场一体化机会,是西南边疆地区从边缘走向前沿难以复加的“天时”,但更需要西南边疆地区在发展思想、体制机制乃至发展战略等方面的革故鼎新。其次,作为中国通向东盟国家的前沿阵地和桥头堡,开放型经济战略下,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有助于扩大西南边疆地区的市场规模(潜力),增强市场凝聚力,实现产业和要素的聚集,但唯有不断扩大对东盟经济体的开放,西南边疆地区才可能实现“地利”禀赋优势与发展战略的匹配,才可走上良性循环的开放之路。最后,中国与东盟边境地区相近的风俗、相通的文化、历史的渊源,都有助于扩大西南边疆地区实现“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和”优势。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边缘走向前沿:CAFTA背景下西南边疆地区开放型经济研究/胡超著.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9
(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研究丛书)

ISBN 978-7-5640-8547-7

I. ①从… II. ①胡… III. ①边疆地区—外向型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西南地区 IV. ①F127.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7738号

出版发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100081

电 话/(010) 68914775(总编室)

82562903(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9.5

字 数/176千字

版 次/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9.00元

责任编辑/申玉琴

文案编辑/申玉琴

责任校对/周瑞红

责任印制/吴皓云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各方开始全面履行协议，自由贸易区进程开始加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尤其是经贸关系，从来就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也并不是只局限于亚洲，而是受世界市场的影响。因此，在世界经济大背景下，研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有很重要的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后，由于急需从国外先进国家得到资金、外汇、技术，以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所以与东盟国家类似，实行出口导向战略，鼓励加工工业的发展以扩大贸易出口，鼓励外商投资以引进技术管理经验。中国低廉的商品充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外贸结构不合理，尤其是形成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后果很严重。当前的全球性经济失衡反映出“美元体制”下中国及东盟各国面临的诸多困境。后危机时代中国与东盟加强贸易、投资、金融合作是摆脱美元依赖、转变增长方式的重大选择。

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各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尽管失业率依然较高，但全球经济信心逐步恢复，经济先行指标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得到回升，工业实际产出开始回暖，经济增长预期上调，全球经济逐步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后危机时代”。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在加强合作、积极应对危机以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在深入反思此次危机产生的根源。国内外学术界对此次危机的根源有一点是公认的，即“美元体制”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有重要的关联。从中国及东盟国家的发展来看，由于其在工业化进程中具有外需拉动等特点，对美国市场形成了强烈的依赖，从而产生了价格稳定尤其是对美元名义汇率稳定的自发需要，导致它们在出口增长的同时外汇储备不断增多，最终形成对“美元体制”的支撑。在此过程中，美国通过充当中国、东盟各国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而“俘获”了这一地区，使得这一地区成为“美元体制”最主要的受益者和依赖者，进而也自然成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受害者（李晓，2010）。

本丛书研究的市场提供者是指特定区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简称10+1，10个东盟国家包括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内进口贸易市场的提供者、主要投资国、贸易结算货币的主要提供国。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哪个国家率先成为区域或世

界的市场提供者，则优先成为世界分工和贸易的最大利益获得者，英美莫不如此。美国双赤字多年，经济失衡严重，之所以还未衰败主要是目前美国仍为世界市场的最大、最重要的市场提供国。

当前的全球性经济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美元体制”下中国及东盟各国面临的诸多困境。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2010 年建成，自由贸易区内各项协议全面履行，区域内创造效应增大，为摆脱“美元体制”造成的困境创造了有利条件，即通过区域贸易转型在区域内培育市场提供者，摆脱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就现阶段中国及东盟诸国经济发展状况而言，日本和中国是最有潜力成为区域内市场提供者的国家，但日本由于国内市场空间狭小、高龄化社会等因素，难以发挥相应的重要作用。相对而言，中国最有希望成为该地区的市场提供者。从 2010 年中国与东盟 10 国的对外贸易数额来看，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三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位列世界的第五位，居韩国之后。中国与东盟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趋同，取代美国成为自由贸易区内最大的市场提供者仍需时日，尤其是中国成为东盟国家的主要投资国还有很长的路程。因此本研究不仅有助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体化的加深及多边国家关系的睦邻友好，促进中国南部边疆的稳定和谐，而且对于该地区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优化该地区贸易结构和经济结构，推动中国对外经贸合作方式转型——由出口导向向进口导向转变再到进出口平衡、由吸引外资为主到扩大对外投资为重点再到平衡，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由外需依赖变为内需主导、粗放增长转变为集约增长，有重要意义和应用价值。

另外，金融危机也暴露出现阶段中国与东盟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所面临的困境。后危机时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必须通过加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此过程中，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至关重要。目前，通过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途径实现人民币亚洲化的条件尚不成熟，人民币还不具备在东盟地区充当投资货币的能力。因此，中国当局决定在发挥人民币区域结算货币的功能上寻求突破。随着自由贸易区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和在中国地位的逐步上升，中国已经发挥了东盟贸易集聚地和出口平台的作用，如果中国通过市场开放和扩大内需成为区域内最大市场提供者，则将增加东盟各经济体对人民币的实际市场需要，提高人民币的被接受程度，使其逐步发展成为区域内的结算货币，实现以进口带动对外投资、以投资带动人民币的区域化。

总之，对后危机时代中国作为东盟市场提供者的地位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经济地位如何体现、靠什么来体现的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一个自由贸易区内的经济核心实质是区域内的市场最大提供者，从而拓展与创新已有的国际区域合作理论和国际分工理论，因此本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贸易遇到很多障碍，中国的扩大内需与贸易结构的调整已迫在眉睫，而在自由贸易区框架内中国市场作为东盟市场的延

伸,实现区域贸易转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东盟最大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加快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进而加速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顺理成章,因此本研究实践意义重大。从国际关系角度看,本项研究成果有助于中国与东盟睦邻友好,促进中国南部边疆的和谐稳定发展,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摆脱美元依赖、健康发展也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发挥中国在亚洲及世界的积极影响。

本研究是中国—东盟研究中心(广西科学实验中心)开放课题“CAFTA 建成后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研究, dm1002”的结项成果,其内容包括四部分(独立为四部著作):《中国作为东盟国家市场提供者及地位研究》(王新哲、刘志雄著,结项成果之一)、《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的效应及影响研究》(刘志雄著,结项成果之二)、《中国—东盟相互投资制度研究》(廖东声、熊娜著,结项成果之三)、《从边缘走向前沿: CAFTA 背景下西南边疆地区开放型经济研究》(胡超著,结项成果之四)。它们分别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市场关系、中国与东盟的相互投资及制度安排、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开放经济的影响角度研究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

本研究的创新点表现在:

(1) 对市场提供者经济地位演进规律的理论与经验分析。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从吸引外资为主到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从单纯美元的接受国到区域化主要货币提供国的转变,是发展中大国成为区域及全球市场提供国的必由之路。

(2) 建立计量模型对中国作为东盟市场提供者进行实证分析。产品市场提供者、对东盟主要投资国、贸易结算主要货币提供国 3 大因素相互作用,加强了中国作为东盟市场提供者的地位。

(3) 人民币区域化的切入点是面向东盟国家。人民币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结算货币,而中国成为东盟国家产品市场提供国和主要投资国是前提。

(4) 中国与东盟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东盟对中国出口的增加均有助于东盟对中国投资。地理距离并未阻碍东盟对中国投资, CAFTA 的建立也并不影响东盟对中国投资。东盟对中国投资迅速增加,投资效应非常明显。研究表明,东盟对中国投资表现出明显的地带差异,区域内差异也比较显著。在区域内差异中,东盟老成员国区域内差异大于东盟新成员国区域内差异。

(5) 以中国—东盟经济社会资源为基础,梳理中国—东盟双边投资制度,定性分析了中国—东盟双边投资制度的贡献。根据分析结论提出了提高中国—东盟双边投资效率的政策建议:构建中国—东盟双边投资特区。

(6) 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边界效应”和“马太效应”是导致西南边疆地区无法充分发挥地缘优势的重要制度现象。本研究分别从城市化和市场

化的制度层面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突破“边界效应”以及实现“马太效应”逆转的机理及可能性。

由于东盟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制度各异，所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的经贸关系不但与亚洲市场紧密相连，还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期间，他们的经贸关系也会出现许多微妙的变化。本研究只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的研究成果之一，如果能对这方面的研究给予点滴启示，则我们会感到很荣幸。相信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不断发展，还会有更新、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出现。本项目研究成果中的不足，也欢迎各位专家指正。

王新哲

2013 年夏于相思湖畔

序

区域经济的均衡协调关乎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在我国依然突出，尤其是东西部区域间。通过多年的政策倾斜、资金扶持和对口帮扶，尽管东西部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呈逐渐收敛态势，但绝对差距仍然显著存在。其中，处于西部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经济发展长期徘徊不前，一度成为贫困落后地区的代名词。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大力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崛起”“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和谐边疆的宏伟目标下，如何促进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跨越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崛起的历程表明，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的完美匹配——对外开放以及由此不断提高的开放型经济水平是促进其快速发展的重要法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面对新的国际经济环境，西部边疆地区经济的跨越发展迫切需要走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之路。那么，如何实现集西部大开发政策优势、民族地区扶持和边疆区域地缘优势于一身的西部边疆地区的对外开放再上新台阶，进而实现东西部区域的均衡协调发展？基于这一目的，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研究成果（08CMZ013），本书以西南边疆地区的广西、云南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带来的机遇，系统地分析了提高西南边疆地区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相关问题。其基本结论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框架下，西南边疆地区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显著优势。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是西南边疆地区从边缘走向前沿，实现跨越发展的不二选择。

首先，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的建立，不断扩大的经济开放度为西南边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追溯西南边疆地区与东盟的商贸往来，由于缺乏制度层面的保障与推动，其商贸规模始终无法得到有效扩张，是严重制约西南边疆地区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提升，使其陷入“内卷”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无论是贸易总量还是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方面，西南边境地区均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总量规模小，说明西南边疆地区没有很好把握前一轮开放、开发的机遇，与东盟国家相邻的地理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弹性小，说明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还存在问题，经济运行上还存在低效率的阻碍因素。因此，牢牢把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带来贸易、投资等市场一体化机会，是西南边疆地区从边缘走向前沿难以复加的“天时”，但更需要西南边疆地区在发展思想、体制机制乃至发展战略等方面的革故鼎新。

其次，作为中国通向东盟国家的前沿阵地和桥头堡，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为西南边疆地区面向东盟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地利”条件。根据空间经济学原理，内向型发展战略下，国内市场十分重要。边境地区远离国内中心市场，狭小的市场范围和产品运输中的“冰山”成本使得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无法享受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带来的好处而选择远离边境地区向更具潜力的中心市场集聚。即使是边境地区与中心市场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空间竞争的结果依然导致边境地区更多企业向中心市场集聚，加剧边境地区的产业“空心化”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此时，对边境地区而言，边境分割扭曲了市场，对企业的市场潜力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内向型发展战略下，边境是一种障碍，它只会导致国家中心区域的更加繁荣，边境地区的越发落后。外向型发展战略下，由于企业同时面对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而边境区域位于二者中心，从而具有先天的区位优势。靠近外部市场的低进入成本使边境地区的吸引力上升，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制造业企业向边境地区集聚。与内向型发展战略相反，边境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会成为其吸引更多国内其他区域制造企业到边境地区集聚的有利因素。因此，在开放和一体化下边境地区将得到快速发展。随着国外市场地位的上升，边境地区的市场规模（潜力）会得到进一步扩张，市场集聚度会显著增强，必将吸引更多生产要素、企业和消费者流向边境区域，边境地区将从边缘位置转变为真正的中心位置。因此，西南边疆地区唯有选择以东盟作为主战场的开放战略，才可能实现“地利”禀赋优势与发展战略的匹配，才可能走上良性循环的开放之路。

再次，西南边疆地区与东南亚地区因边民经济生活的共同要求、经济上相互调节产品余缺、相互满足生活所需而建立的民间贸易往来历史久远。期间，虽历经波澜，但从未“割裂”的商贸纽带成为西南边疆地区较其他区域更为有利的人文优势。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东盟经济溢出效应的逐渐凸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国际经济及地区经济事务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与东盟经济体的相互依赖性和互补性日益增强。因此，在延续边境地区两国人民交往优势的基础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无疑是推动西南边疆地区提高经济开放水平，实现“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和”优势。

作为一个年轻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需要在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的基础上，拓展合作范围，深化合作层次。因此作为一个动态过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各类新情况、新挑战、新问题必然会层出不穷。同时，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同区域面临约束条件的差异决定了不可能存在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和途径，因此本书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西南边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研究，旨在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期望更多关心西部边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学者投入其中。本书亦是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研究中心重大招标课题“CAFTA 建成后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研究，

(dm1002)” 结项成果之四。本书的圆满完成也得到了中国—东盟研究中心（广西科学实验中心）及研究团队的支持，在此也一并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本书所提出的各类观点和政策建议有待实践检验和日臻完善，对于本书研究所出现的不足之处还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胡 超

摘 要

相对沿海、沿江地区的高度开放型经济，地处沿边且具有良好地理优势的西南边疆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却不尽如人意。作为主要少数民族聚居区，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备受各级政府关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全面建成将是提高西南边疆地区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机遇。本项目分别从贸易、产业和制度等三个层面探讨了 CAFTA 建设进程中西南边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绩效，分析了制约其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原因，并就未来充分发挥毗邻东盟的地缘优势，利用 CAFTA 全面建成的机遇促进其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提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鉴于西南边疆地区与东盟国家对外贸易中“正式”国际贸易和“非正式”边境贸易并存的现实，本书分别对“正式”国际贸易和“非正式”边境贸易的发展及绩效进行了考察。从“正式”国际贸易对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的弹性来看，CAFTA 对提高西南边疆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影响相对较弱，地缘优势并未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来，西南边疆地区的“非正式”边境贸易先后经历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下的复活兴起”“贸易形式升级下的成长扩张”“政策调整下的停滞起伏”“商品结构单一增长乏力”等演变轨迹。与“正式”国际贸易的“一对多”“复杂性”“有法可依”和“聚集式”特征相比，“非正式”边疆贸易的“一对一”“单一型”“无法可依”和“分散式”是导致其陷入发展困境，对促进边境县市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

农业基础水平相当是我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起点，也是未来西南边疆地区与东盟农业合作与发展的重要基石。庞大的市场规模是我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动力源泉，也是未来西南边疆地区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重要动力。农产品贸易关系上，我国与东盟既存在互补性亦存在竞争性，在亚热带农产品上双方竞争关系较为明显。因此，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在对我国农业带来整体福利提高的同时也会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农业发展造成局部的冲击，但整体福利大于局部冲击。我国与东盟在制造业产品生产上日趋紧密的分工关系为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的演进奠定了基础。西南边疆地区的动态综合比较优势则为其积极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并融入这一区域生产网络提供了充足的条件。CAFTA 建设进程中，西南边疆地区与东盟的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迅速，但“自上而下”式忽略了区域特征的制度供给，导致了高等教育合作形式的单一，影响了合作绩效的提升。旅游作为西南边疆地区和东盟较具优势的产业，合作潜力巨大，但各国在《服务贸易协

议》中有关旅游服务的有限承诺和高进入壁垒是旅游合作市场进一步开发的重要障碍。

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边界效应”和“马太效应”是导致西南边疆地区无法充分发挥地缘优势的重要制度现象。本书分别从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制度层面分析了 CAFTA 背景下突破“边界效应”以及实现“马太效应”逆转的机理及可能性。单一指标上，西南边疆地区早已具备并理应实现边界效应的突破，其关键制约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将各类优势因素进行整合。城市化的要素积聚、分工深化和市场制度建立功能恰好能够有效地综合各种单一优势因素，进而实现边界效应的突破。市场化滞后是导致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出现“马太效应”的主要原因。对内，市场化滞后导致西南边疆地区生产效率低下，且有限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流向了东部沿海地区，进而在东西部发展上呈现出“马太效应”。对外，在 CAFTA 各类机制逐渐完善、要素流动更为自由的情形下，市场化滞后亦会导致西南边疆地区有限的生产要素流向市场化程度更高的东盟国家，进一步加剧“马太效应”。反之，西南边疆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改进则会实现“马太效应”的逆转。

关键词：CAFTA 西南边疆地区 开放型经济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costal areas whose economies are highly opening, the export-oriented economy of Southwestern Frontier Region (SFR) where the minorities live, does not develop as well as expected, even though the SFR has the distinct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The fully building of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 is deemed a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FR's economy opening. This book has explor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FR's export-oriented economy, analyzed the constraint factors of the SFR's export-oriented economy development respectively from the trade, industry and institution aspects and given related policy advices for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of the CAFTA to improve the SFR's economy opening.

Considering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border trade coexisting in the trade between the SFR and the ASEAN, the book has respectively investigated th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border trade. In the view of the elasticit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ontribution to the SFR's economy growth, the CAFTA has really made some contribution to the SFR's export-oriented economy, but not significant, which means that the SFR's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are not fully exert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reform and openness, the SFR's border trade has successively experienced expansion, stagnation of ups and downs, weak growth periods. Compar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ne-to-many, complexity, law to follow and accumulation, the border trade contains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one-to-one, singleness, no law to follow and dispersal, which leads to no obvious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As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level between China and the ASEAN is not significant,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has become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CAFTA cooperation and also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SEAN and the SFR. The book points out that the huge size of the CAFTA market provides the driving force of bilateral agriculture trade. In the relationship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ASEAN, the book deems that the complementariness and competition are coexisting in the bilateral trade, and the competi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ASEAN and the SFR.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has not only brought interests for China, but also made an impact on the SFR's agriculture, however, the interests are greater than the impact. With the closer and

closer manufacture labor divi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ASEAN, the CAFTA regional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networks gradually formed. The book considers that the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SFR could encourage the coastal industry to transfer and gradually integrate into the CAFTA regional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networks. The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ASEAN develops fast, but still there are lots of problems, such as the insufficient institution supplying which leads to the cooperation in a single form and low cooperation performance. Even though the tourism industry cooperation is competitive between the SFR and the ASEAN, there is a great cooperation potential. So, what the governments needs doing is eliminating the collaboration barriers, especially the obstacles in the agreements on trade in service which are signed between China the and ASEAN.

The book considers that the “boundary effect” and the “Matthew effe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FR’s export-oriented economy are very important reasons which constrain the SFR’s making use of the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The book has respectively discussed the probability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boundary effect” and the “Matthew effect” from the institutional angle of urban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In the single index, the SFR has already achieved a breakthrough in the border effect; however, as lacking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o integrate several advantages factors, the border effect sill exists in the SFR. Urbanization has the functions to accumulate elements, deepen the labor division and help to build market system, so it can achieve to breakthrough the border effect easily. The book deems that the lagging of marketization is the main reason that the SFR sill has an obvious “Matthew effect.” Internally, the lagging of marketization could lead to a low productivity, and the limited production factors flowing to the other areas, and gradually form the “Matthew effect” between the coastal area and the SFR. Externall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AFTA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more freedom factor flowing, the lagging of marketization could also make the limited production factors flow into the ASEAN countries whose marketization is higher and exacerbate the “Matthew Effect.” Conversely, if the SFR’s marketization was higher, the SFR’s economy development could realize the reverse.

Key Words: CAFTA; Southwestern Frontier Region; Export-oriented Economy

目 录

绪 论	(1)
-----------	-----

贸 易 篇

第一章 西南边疆地区国际贸易的发展及绩效	(11)
1.1 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	(12)
1.2 广西、云南数据的检验	(13)
1.3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的再检验	(17)
第二章 西南边疆地区边境贸易的发展及绩效	(20)
2.1 边境贸易发展演变的轨迹	(21)
2.2 西南边疆地区边境贸易发展的绩效检验	(28)
2.3 边境贸易与国际贸易差异的比较	(32)

产 业 篇

第三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西南边疆地区农业的 合作与发展	(39)
3.1 农产品贸易的起点：基础水平相当	(41)
3.2 农产品贸易的动力：“大市场”规模效应	(42)
3.3 农产品贸易的关系：“互补性”抑或“竞争性”	(44)
3.4 农产品贸易的福利效应：“整体利益”与“局部冲击”	(46)
3.5 未来西南边疆地区与东盟国家农业合作与发展的方向	(49)
第四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西南边疆地区制造业的 合作与发展	(51)
4.1 区域生产网络的概念及兴起	(52)
4.2 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及特征	(53)
4.3 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的演进及可能性	(57)
4.4 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下西南边疆地区制造业的嵌入： 动态综合比较优势的视角	(60)
第五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西南边疆地区高等教育的 合作与发展	(66)
5.1 有关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文献综述	(67)
5.2 西南边疆地区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形式和绩效	(68)

5.3	未来西南边疆地区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潜力: 制度供给的视角	(76)
第六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西南边疆地区旅游业的合作与发展	(81)
6.1	东盟各国国际旅游发展的基本特征及比较	(81)
6.2	东盟国家到西南边疆地区入境旅游的 O—D 对接关系	(84)
6.3	西南边疆地区与东盟国家旅游合作的障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的视角	(90)
6.4	未来西南边疆地区与东盟国家旅游合作方向及建议	(92)
制 度 篇		
第七章	突破“边界效应”: 城市化与西南边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	(97)
7.1	边界效应的含义及相关研究	(97)
7.2	边境地区开放的国际经验	(98)
7.3	西南边疆地区的边界效应	(99)
7.4	自由贸易区背景下城市化与西南边疆地区边界效应的突破	(101)
第八章	逆“马太效应”: 市场化与西南边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	(106)
8.1	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开放进程中的“马太效应”问题	(106)
8.2	西南边疆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与“马太效应”	(108)
8.3	中国与东盟国家市场化水平: 基于营商环境的比较分析	(115)
8.4	自由贸易区背景下市场化与西南边疆地区“马太效应”的逆转	(119)
附 表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中东盟各国有关旅游服务的具体承诺	(122)
参考文献		(127)

绪 论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 and 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正式建成并全面启动。至此,即自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CAFTA已经历了8年的建设。无论合作的广度还是深度,CAFTA在各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中尤以经济贸易领域为甚。

如图0.1所示,2002年成为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快速发展的“起飞点”。在此之前,双边贸易进出口总额一直处于500亿美元之下,且年增长速率也较为缓慢。2002年双方贸易进出口总额一举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47.8亿美元。自此之后,双边贸易便一直呈加速发展态势。2004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1059亿美元,提前一年实现了突破1000亿美元的预定目标;2005年和2006年,双边贸易总额每年净增300亿美元;2007年贸易总额达到2025.5亿美元,相比2006年增长25.9%,提前三年实现了突破2000亿美元的预定目标;2008年,双边贸易额更是达到2311.2亿美元,同比增长13.9%。尽管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冲击,2009年双边贸易额有所下降,但经过短暂恢复调整之后,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之“东风”,仅2010年上半年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就增长了48%,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了55%,成为拉动中国和东盟经济走出危机阴霾的重要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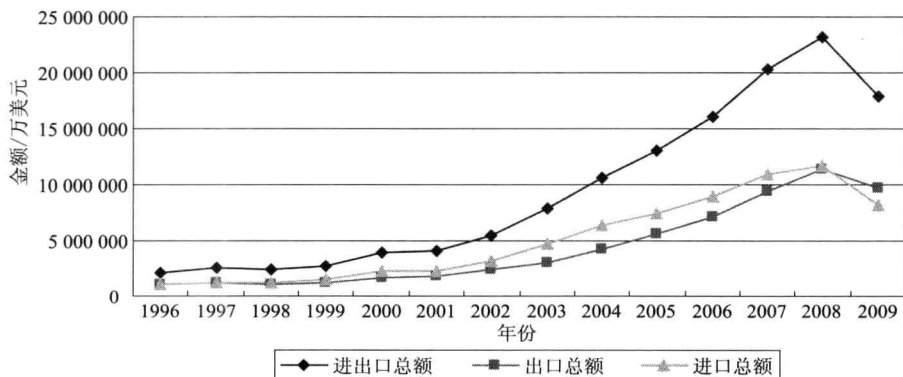


图0.1 中国—东盟贸易发展情况(1996—2009年)

数据来源:其中1996—2008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009年数据来自 ASEAN Merchandise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中国—东盟日益扩大的双边贸易正成为双方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